



日本藩閥軍人的過去與現在

許升階

一 藩閥軍人政治上的權威

幾十年來日本雖和英法諸國先進國一樣的有憲法，有政黨，有議會，有內閣，一樣的採用了內閣制的立憲政制，但兩者之間的內閣制度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的。日本直接總攬全國實際政治的總機構雖也和英法諸國一樣是內閣，但英法諸國的內閣必須由議會內最占勢力的分子，即最能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多數黨組織。內閣總理的任命權雖在元首，但元首任命的自由受了『議會多數黨』這一條件的嚴格限制，實與議會自己任命無甚區別。同時內閣一切的公式行為須對議會負責，議會隨時可以不信任的方式推倒牠。由這種種關係，內閣的行政不能隨便違反議會的意志，即內閣不能隨便違反民意（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所以，內閣雖有很大的行政權，而議會控制這種行政權的力量還要更大。英法諸國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夠見諸實際，這是很

重要的一個關鍵。而日本歷屆組閣的人物并不以任命議會內多數黨為常規慣例，議會內的少數黨可以受天皇的救命組閣，議會外的非政黨人物也同樣可以受命組閣，而且這類非政黨的組閣人物竟占歷屆內閣的大多數。其次，幾十年來因議會表示不信任而辭職的只有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的清浦奎吾內閣，所以事實上也不會演成內閣一定對議會負責的慣例，法律上更尋不出此項規定。由此可知日本的內閣雖有很大的行政權，但議會沒有多大權力控制牠，內閣的行動有脫離議會的意志，即人民的意志的危險。此外，日本議會在他方面的權限，如憲法修改權、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等外交權，以及財政權等都遠小於英法諸國的議會；所以英法諸國的議會更能控制內閣，而日本的議會更不易控制內閣。日本民主憲政之所以至今仍不能如英法諸國的貫徹到底，這種政制上的弱點是很重大的一個原因。

日本的內閣受議會拘束之處雖然有限，但牠的產生，去留等等依

舊脫不開別一種特殊勢力的支配，實際上內閣的權力仍是不能完全獨立行使的，內閣的政策仍是不能完全自由決定的。而日本的內閣制之所以終未能澈底的走上英法的內閣制的大道，主要的原因也就是由於受着這一種特殊勢力的阻擊之故。這一種特殊勢力就是日本的元老和軍部，元老和軍部的活動人物就是藩閥軍人，機關是兩個，主持的人物是一體。他們就潛伏在這由習慣演成（元老制）或由法律規定（軍部）的兩個合法的機關內支配着日本的內閣，操縱着全國的政治。固然，有時內閣也要受到貴族勢力的支配，但這是比較近代的事，這力量遠小於藩閥軍人，也弱於政黨勢力。同時藩閥軍人的力量有時也見及於樞密院和貴族院，但這是貴族們的中心地盤，其金城天池還是在元老和軍部。限於篇幅，實例都不在這裏舉述了。

日本從有元老直至今日，總共有山縣有朋、伊藤博文、松方正義、大山巖、井上馨、桂太郎、大隈重信、及西園寺公望八人。綜計這八人的出身，山縣、伊藤、井上、桂太郎屬長藩，松方、大山屬薩藩，大隈屬肥藩，只有西園寺是公卿出身，非藩閥中人，但他的所以昇為元老，雖有其他的條件，然而他追隨伊藤有年得力於伊藤的提攜推轂實在很大，也是與藩閥有深切關係的人物。所以大體講來，所謂元老，實即藩閥軍人的巨魁的別名。日本的元老只是一種習慣的制度，牠的地位、職責各方面都無明文規定。但是這樣一個沒有法律根據的制度，實權卻很大。依日本憲法，內閣雖以天皇的名義行使一切權力，然而事實上牠的政策決定及

執行，除有時要受到軍部的左右或樞密院等機關的影響外，也要受到元老的控制的，國家一切重要政策輒須預先徵詢元老的意見，而組閣人選的推薦，更是牠獨特的權力。

當明治政府設立海陸兩部時，薩藩就霸占了海軍部，長藩就獨據了陸軍部；這是各自依據既成的傳習和勢力，原無足異。薩長兩藩把持了海陸軍部，海陸軍部又依下列幾種事實取得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以左右內閣：（一）是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頒布的海陸軍大臣直接帷幄上奏的勅令，凡涉及軍令軍政軍機性質的事項，可以不通知內閣而直接奏達天皇。這種大臣單獨上奏權是其他各部大臣所沒有的。由於此種特權的獲得，於是海陸軍部隨時可藉口軍機秘密，不受商於內閣而獨行其是，獨立於內閣之外，以破壞內閣行政的整體性。（二）是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年）頒布的非現役海軍大將或中將不能充任海軍大臣，非現役陸軍中將或大將不能充任陸軍大臣的勅令。後雖由現役擴大為預備役或退役的海陸軍大將或中將，但仍非對軍官以外的人公開，一直保存着軍人的單純系統。這一法令更足有效的支配內閣，而內閣也只好任其支配。因為首相組閣時必須先向有推派海陸軍大臣的權力機關軍事參議院要求指派合格的軍官充任海陸軍大臣，以完成內閣的組織；於是軍閥即可藉此要挾內閣贊成其政策，否則拒絕入閣，使內閣無由組成，或是中途退出，而使內閣瓦解。由這兩個法令，不難想見日本藩閥軍人在政治上原來的勢力，說不是先在政

治上有很大的勢力，是不會用勅令給軍部這樣妨害內閣整個行政運行之圓滑的特權的。

纔將是說明元老和軍部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或權利，下面即敘述牠們在這種特殊地位或權利下實際支配日本政治的事實。

日本從有內閣直到現在共計三十二屆。第一、二兩屆都在憲政正式開始以前，可以不論。從憲政已經正式開始的第三屆山縣內閣到現在的第三十二屆廣田內閣，其間除第三、四兩屆是由天皇自己選擇自己任命的以外，自第五屆起以至今日，歷屆組閣人選幾乎沒有一次不是由元老向天皇推薦的。而天皇也幾乎沒有一次不是無異議的接受，所以這種建議式的推薦實不啻就是一種最後的決定。不過，我們應注意，即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第二十一屆以前的歷屆內閣都是由元老們單獨向天皇推薦的，從第二十二屆起，茲後每逢內閣更換，關於首相人選，元老輒就商於樞密院議長及其他重臣們。發生這種變動的原因，恐怕在於山縣、大隈都在大正十一年一、二月相繼逝世，元老只剩松方和西園寺兩人，人少力量感覺單薄，遂自動地要請重臣們參加意見，不過主體始終仍在元老自己。到大正十三年松方又告去世，元老中碩果僅存的西園寺更感孤立的單弱，因以除一方面在事實上依然遇事總徵求重臣們的意見外，一方面在言詞中且幾次露出廢除元老，以樞密院議長、內大臣等重臣們代行元老推薦內閣職權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就藩閥推薦內閣的權力論，以大正十一年為分野。十一年以

前是其鼎盛時代，以後即趨衰落；到十三年松方死，元老中的藩閥全部凋謝，純就元老說，也只剩了一個非藩閥出身的西園寺了，所以藩閥推薦內閣的大權可說也跟着松方之死而全部消沒。以後內閣的推薦權完全落在受民主自由思潮頗深的西園寺元老及其他一般重臣們之手。

藩閥軍人出身的元老與西園寺及其他重臣們之間，因着思想的不同，推薦組閣人選的標準也因之而異。前者的傳統思想是反民主憲政的，不樂推薦政黨人物，希望維持藩閥政治（此輩中的思想也不盡如此，如大隈即是倡導做倣英法責任內閣制的有力者，且身兼憲政會的領袖；伊藤的思想也較開明，政友會即其所創立。不過他們當時在其他懷抱反民主憲政思想的同僚中，不易獨持自己主張，有時仍不免附和於後；伊藤且終禁不住山縣、松方的力勸，而宣布脫離政友會。故就元老中的整個藩閥軍人集團言，他們的思想是保守的，反民主憲政的；後者的思想是傾向民主憲政的，不忘推薦政黨人物，企圖促成政黨政治。所以從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年）的第五屆伊藤內閣到大正十三年第二十三屆清浦內閣，十九屆內閣中只有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七、第十九、第二十總共七屆政黨內閣，其餘的十二屆內閣中除第二十三屆是貴族內閣外一概是由藩閥組閣的（第五屆以前的四屆內閣也都是藩閥內閣。）就是這七屆政黨內閣其中有些仍不能不依賴於藩閥的支持，最後因未能滿足藩閥軍人的要求而為軍部

106568

推倒的也不乏其例。如第十二屆的西園寺政友會內閣，其能以成立的，原因在和藩閥提攜。嗣後西園寺和桂太郎因郡制廢止案意見相左，提攜決裂，遂致後來內閣爲着救濟財政困難的軍事費延緩案嚴遭陸海軍部的反對，故意逼使內閣在無法解決財政難題中只好出於辭職一途。第十四屆西園寺內閣時期，陸軍大臣上原勇作要求增設二師團案，在閣議上以適值財政困難未獲通過，於是山縣嘯使上原單獨奏請辭職，其他陸軍將佐也共同拒絕派員入閣。西園寺雖擁有下院的絕對多數，但因找不到陸相繼任人，內閣的組織無法完成，不得已只好總辭職。他如第十七屆的同志會、中正會聯合的大隈內閣之所以能夠順利組成，原是藩閥附有他必聽命參謀本部，接受二師團增加案，及相機對華提出二十一條等條件的。多年盛倡自由主義的大隈，爲求組閣的成功，終不能不接受了而且實施了反對者的主張。雖然如此屈讓，以後大隈內閣之倒，還是由於山縣的硬逼作用。足徵這時期藩閥軍人在政治上的權威之盛。

而從大正十三年的第二十四屆加藤高明內閣到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的第二十九屆犬養毅內閣，六屆內閣中無一屆不是政黨內閣。在這一時期內，藩閥軍人自己推薦藩閥集團中的人物組閣，以直接把握政權的威勢也隨着十三年藩閥出身的元老的全部死亡——即其推薦內閣權的消沒而死亡了，這一時期可說是日本民主自由主義擡頭的時代。實則這時代的開始，可以上溯到大正七年（一九一八

年）第十九屆政友會原敬內閣，因爲在此以前伊藤、大隈、西園寺諸人雖曾各以政黨領袖的資格組織過政黨內閣，但他們之能以組成，憑藉政黨本身的力量實要遠遜於依賴藩閥、元老、官僚諸種地位的力量，閣員的決定也非以政黨爲中心，實際只能算是準政黨內閣。其以純粹平民出身，完全依賴政黨本身的力量，一躍而膺國家首揆的，在日本憲政史上，原敬要算第一人；益以他過人的材略，在任內很表現了些政黨政治的力量。繼任的高橋也仍是政友會內閣，接着雖間隔了兩屆藩閥及一屆貴族內閣，但總計爲時不出兩載，以後就繼起了第二十四屆憲政會加藤內閣，從此政黨內閣一直綿延到昭和六年的犬養毅。這時期政黨勢力的擡頭，與藩閥的元老之凋謝固然有關，但亦自有其時代的背景，此點留待以後論述。這時期藩閥軍人的氣燄雖被政黨壓抑一些，但其潛伏的力量還是不容輕侮的。即以諸屆政黨中最表現了政黨政治的相當力量的原敬和濱口（第二十七屆）兩屆內閣說，原敬爲得要保持內閣的地位，有時還是須得迎合軍人的意旨；濱口在軍事參議官審查倫敦海約時，還得對他們讓步，纔能奏請天皇批准。至於到最後的第二十八屆若槻及第二十九屆犬養毅兩屆政黨內閣，政黨的勢力已成強弩之末，藩閥軍人的火燄又開始高張了。昭和六年的「一九一八」專變完全是軍部利用直接帷幄上奏權瞞着內閣的單獨行動事情就爆發在第二十八屆的若槻內閣任內，以後因不堪軍部對華軍事外交的專擅，未及八越月的若槻內閣終於在不安中辭職下臺，繼起的犬養

毅內閣在軍閥援助的應允中成立，內閣的軍事外交總算在軍部的意旨下步趨了，然終不滿於急進的軍人，不能免於昭和七年的「五一五」政變，犬養毅首相就犧牲於軍人法西斯獨裁的企圖中。前此的日本藩閥軍人只是在法律所許的特權掩護下以間接和平的方式進行倒閣，這次竟然進一步在法律之外採取直接武力的非常手段，這是日本政治史上劃時代的一大變局。其實「九一八」之後的一切發展已是這一大變局的前奏，政黨政治實質上業已埋葬於北大營的砲火中，至相府軍刀一揮，流血倒閣遂開明治以來政治之紀元，同時僅僅殘餘的政黨內閣的形式也斷脛於刀光之下。劃時代的變局至此乃更黑白釐然而跨入一個以下所述的軍人專擅的新階段，這階段至今仍繼續着。

自犬養毅刺死以至今日共歷三屆內閣，即第三十屆齋藤，第三十一屆岡田，及纔成立不久的第三十二屆廣田內閣。齋藤和岡田都是思想上接近自由主義而出身薩藩的海軍耆宿，廣田也非政黨人物。直到現在，內閣的推薦權雖仍握在西園寺元老及重臣們的手裏，但迄不敢繼續維護他們夙所主張的政黨內閣，而推薦一些站在急進軍人與政黨財閥中間的緩衝人物，足見這種權力的行使已經喪失了獨立性，而不得不受軍人勢力的左右了。反之，軍人法西斯獨裁內閣的終未實現，也同時表現着元老重臣政黨們政治上相當勢力的存在。但綜合的看起來，他們只有藤葛似的牽掣着軍人的脚步不讓太過突晉的消極的力量，始終缺少截然阻止的能力，結果軍人仍是不息地盡可能地踏步

前進，不過脚步有時稍微緩慢了一點而已，而且這種牽掣的力量似乎有越弄越削滅的趨勢。我們看，在齋藤和岡田的時期當中，舉凡政治外交軍事各方面，如長城之戰，塘沽協定，年來激化不已之華北情勢以及日俄蒙滿的種種不輟的糾紛，在滿機構之由多元組織變為一元組織的改革，龐大國防軍事費的不斷的誅求，企圖全體肅清自由主義學者另建所謂日本主義陣容的「國體明徵問題」的一逼再逼，以及國際聯盟的退出，華海約的宣告作廢和今年開始的退出倫敦軍縮會議，凡此種種，無在不是軍部隱然為其領導，內閣不過居於追隨扮演的地位。但齋藤和岡田心理上仍和元老及其他重臣們相似，不同情於軍人內政外交的太過急進，而傾向於維護憲政的。他們的中心方針，是一方面大體上依順軍人的主張以和緩其態度，一方面仍盡其最善的能力以調整甚至防阻軍人的急進，而企圖逐漸的做到「憲政還原」。因此在幾年來的日本政治上，我們仍然可以時常尋出他們與軍人間的對立與衝突，略舉幾個較顯著的例子，如前此中東路讓渡交涉的簽字，軍人希望維持日俄緊急的局面，原持反對，終以元老重臣政黨的力量決然簽字，一時日俄危局賴以平穩。去年軍人華北五省自治的進行也終被他們先從華北修築鐵道開發礦山及其他資源，以補充日本國防資源不足的議論壓下。去年十一月間的軍費預算問題，高橋藏相堅持着他的公債漸減及不增稅的原則，結果軍人讓步。這次總選舉時岡田，高橋親出講演為民政黨助陣，不啻是公然維護政黨打擊軍人的行動上

的表現。而前述內閣對於軍部種種主張的實施，也多是經過了軍人的一逼再逼，進行并不是如何順利的。凡此一切，或發生於齋藤任內，或發生於岡田任內。軍人既不得暢行其主張，因以齋藤終由軍人的不滿而下臺，岡田也推倒於最近「二二六」的軍人政變中。這次政變可說是「五一五」的延長而重大過之，前任首相現任內大臣齋藤，藏相高橋都被擊斃，侍從長鈴木重傷，首相岡田幾遭死難，前內大臣牧野及西園寺元老都僥倖逃脫，而主張溫和一點的陸軍首腦渡邊也遭刺死，這簡直是要把元老重臣及內閣領袖一網打盡，好貫徹軍人們的積極主張。不久廣田拜命組閣，但軍部反對新閣員名單（因為新閣員大都是溫和派），干涉到內閣的人事問題，並決定新陸相寺內中止入閣，新閣大有流產之勢。結局，廣田不得不更改軍部不滿的閣員，同時接受了軍部所提新陸軍大臣入閣的下列條件：（一）國體明確的徹底，（二）國防絕對擴充與調整，（三）國民生活的安定與確立，（四）外交的澈底劃新。今後廣田內閣的內政外交之將更趨硬化是必然的了。「五一五」以來日本的政治是岡田內閣較齋藤內閣法西斯化，廣田內閣又較岡田內閣法西斯化，而廣田的步伐遠迅捷於岡田，這與「二二六」的關係當然很大。

現在再把幾十年來日本藩閥軍人在國家重要政策的決定及執行上的影響概略的說一說。幾十年來日本的中心國家大計，就是向外發展的大陸和海洋政策（大陸較重要於海洋，中日戰後，後者以受英

美在菲律賓、澳洲勢力膨脹的致命打擊，已改為專致力於大陸政策的突進），幾十年來日本的中心歷史，就是貫徹此種國策的活動史，幾年來日本的能以光榮的躋於世界列強之林，就是由於此種活動史一頁一頁勝利的結果。而國策的中心決定人物就是藩閥軍人，如大陸政策即長藩所決定，海洋政策即薩藩所決定的。國策貫徹的中心活動人物也是藩閥軍人，如明治二十七——八年（一八九四——五）的中日戰爭的正面主持人就是藩閥伊藤內閣，三十七——八年（一九〇四——五）的日俄戰爭的前奏曲英日同盟締結的策動人就是伊藤、山縣、井上、松方這些藩閥元老，而隨後爆發的日俄戰爭也是完成在藩閥桂太郎內閣之手。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大隈政黨內閣的對華提出二十一條，也還是對於藩閥所提組閣條件之忠實履行，主動者依然是藩閥軍人。而「九一八」事變以至今日的一切內政外交，前面已說得相當清晰，也無一不是由軍人為其領導。這就表明着日本歷來的重政策大都是藩閥軍人決定的，日本歷來轟轟烈烈的功業大都是藩閥軍人成就的。

總之，綜合說來，幾十年來日本的政治居恆為藩閥軍人所支配。仔細分析來說，大正七年以前是藩閥軍人勢力很盛的時期，他們藉元老與軍部兩個強大的合法壁壘以操縱政治。從大正七年原敬組閣到昭和七年犬養毅被刺死是政黨勢力比較擡頭的時期，在這時期中藩閥的元老日漸凋謝，大正十三年松方逝世後，元老壁壘完全落入自由主

義派的西園寺及其他重臣們之手，僅殘存軍部勢力在政治上掙扎，這時兩大礮臺已失去一個了。不過這時期軍部的力量雖被壓抑，但仍不容輕侮，這力量從「九一八」起已明顯地在開始膨脹，政黨勢力即日趨銷沉。「五一五」政變爆發以後，軍部一方本身以力量膨脹甚速，一方又獲其他右傾團體的援應，於是在政治上的聲勢乃正式轉入一新的時期。至今方興未艾，這時期中軍人雖然仍舊把握不到昔日藩閥派元老的內閣推薦權及藉此權力以直接主持閣席，但牠找到一個法外的代替力量了，即流血的政變手段，雖說這手段的前途是難捉摸的。

二 藩閥軍人本身的解剖

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端賴諸強藩的雄厚兵力的擁護；當時的諸藩，實即一種擁兵自雄的武人集團，或叫軍人階級。其間固然不乏文人派，但軍人最多而最握權勢，是這一集團的中堅，是這一集團的精神寄託者；就是少數文人派，在少年時代也大抵是受過所謂武士道，即軍人精神訓練的。關於實例，遠者不論，就帝國憲法頒布以後的情形講，如藩閥據以操縱日本政治的兩個機關——元老和軍部，陸海兩部完全為軍人占據這是人人盡知的事實，而七個藩閥元老裏面，也就占了山縣、大山和桂太郎三個——大山曾任陸軍大臣，山縣和桂太郎是軍人兼政治家。又如日本的歷屆內閣大多是藩閥內閣，這從前面可以知道，而藩閥內閣中，又半數以上是軍人內閣（根據彭學沛歐美日本的政黨

二九八——三〇〇頁。）足見陸海軍部及組閣方面，軍人都較文人遠占優勢，而元老席位也是兩分天下幾有其半。同時我們知日本外交上許多事情都是出於軍人的主動，例如甲午的事變是軍人製造出來的，英日同盟的成立亦靠軍人的力量，日俄戰爭是軍人包辦的，吞併朝鮮是軍人幹的，打山東，提二十一條都是軍人作原動力，濟南事件以至皇姑屯案是軍人幹的，這次「九一八」的事件又是軍人演出來的，而「九一八」事變以至今日的一切，更無一不是軍人直接導演出來的。這就是說，日本大陸政策的原動力當首推藩閥中的軍人。藩閥中的文人在這方面的功勳也是不容埋沒的，尤其是文人中的巨魁伊藤氏；但就這兩派在此方面的全部活動史觀察，使我們不得不更加驚服軍人的偉績。兩派主張上通是民主憲政的阻滯者，通是大陸侵略政策的策動人，稍稍不同之處，只是在貫徹的態度上文人不若軍人的直截和猛晉。由上述各方面看來，所謂藩閥也不妨說就是軍閥，藩閥軍人不妨權視一體。

自大正十三年元老松方去世以後，藩閥的文人派再沒有繼起人物，這時的先輩藩閥，無論文人或軍人，都謝落盡淨，從此只留着一般後輩軍人在陸海兩部抱殘守缺。迨「九一八」事變發生，軍人勢力又突呈發展，次年的「五一五」事件以後，一直到現在，軍人在政治上勢力的膨脹又轉入一空前的階段。同時「九一八」以後當權的新軍人如荒木、林銑等與「九一八」以前的舊軍人如山縣、宇垣等也產生左列

(A) 過去舊軍人的中下級幹部是散漫的，毫無什麼組織。而現在的新軍人的中下級幹部則有研究會、讀書會等等的團體；就是散在全國不下三百餘萬的歷年退伍軍人，也有着嚴密的組織，同現役的中下級幹部相呼應，近年且更由此而開始策動地方民間的他項組織。質言之，這就是一種軍人法西斯，在目前日本的諸多右傾團體中，軍人法西斯要居於中心的地位，這中心勢力與有些右傾團體是有着聯繫的。不過迄今軍人內部的組織還未臻嚴密的法西斯化，與外間其他右傾團體的關係也仍只在一種初步的微妙狀態中。一切仍在改進的演變中，這是事實；將來軍人的更趨法西斯化，也是必然——這是為今日的時勢與軍人本身的地位所決定了的。

(B) 舊軍人的中下級幹部自己沒有明確的主張，只是跟着高級首腦的主張而行動。歷來高級首腦的傳統主張，大致不外：(1) 盡忠皇室；(2) 維護并擴張藩閥軍人階級政治上的權勢，反對民主憲政；(3) 貫徹大陸侵略政策。新軍人的中下級幹部以近年來教育進步的結果，軍人的一般智識提高，對於國家社會的認識增強，因以於近年的政黨的腐敗，議會的無能，農村的貧苦，資本主義的弊害……總之驚心慌目的刺戟，浸至喚起對整個政治現狀的不滿，終至產生他們的政治改革主張。(1) 思想方面，反對自由主義，共產主義，而倡導一種『皇道精神』的『新日本主義』；(2) 政治方

面，反對政黨政治，議會政治，而主張法西斯的軍人獨裁政府；(3) 軍事外交方面，主張大規模的擴張軍備，積極解決滿蒙問題，貫徹大陸政策；(4) 經濟方面，反對自由放任主義，而主張改革現行經濟機構，即企圖實現以君民一體之理論為基礎，以國民全體之福利為目的，以國防之整備為標準，以農村及都市的對立之消滅為主要進行目標，以軍部中心之統制經濟為最高理想的經濟政策之經濟機構。

(C) 正因為舊軍人的中下級幹部無組織無主張，及新軍人的中下級幹部有組織有主張。所以前者對於高級首腦只有無條件的服從，縱有不滿，也敢怒而不敢言；後者對於高級首腦是有條件的服從，他們的意見輒足左右高級首腦的行動，高級首腦好像政黨內閣，從中下級幹部宛若政黨議會。因着這種關係，所以關於高級首腦之形成，新舊軍人也不相同。新軍人首腦中試以荒木為例，宇垣在陸相任內曾為分散少壯軍人的勢力起見，將負少壯軍人聲望的諸將官如荒木、真崎等遠調各地。然而反對的聲浪卻以此更形澎湃，宇垣的勢力終於衰落下來，陸軍的人事行政不得受中下級幹部的少壯軍人的牽掣。這牽掣力的第一着的表現，就是荒木的調回到陸軍中央來。當荒木從熊本回到東京任教育總監的時候，沿途各處軍隊的口號是『歡迎我們的荒木將軍』，接着又改膺陸軍大臣，高踞陸軍中央的上位。他的高級首腦地位是形成在全國少壯將校的擁護歡聲

中其餘高級首腦如林銑、川島等，一旦不得少壯將校的擁戴，就怕難以立足的。怎樣纔能獲得擁戴呢？就是要能代表他們的意見，所以現在的新軍人是以主義政見的共鳴而相結合的。而舊軍人的高級首腦則是由前輩首腦從他的囊袋人物中提拔上來，他們中間發生一種主從關係。除開山縣是憑其維新元勳及陸軍建設始祖的地位，自然的成爲陸軍首腦以外，其餘後起的首腦如桂太郎、寺內、田中諸人，都是由山縣的提拔而盤踞高位，都仰着山縣的鼻息，提拔者與被提拔者間成就一種主從的關係。之後山縣已經逝世，更後的宇垣又由山縣所提拔上來的。田中提拔上來，兩人中間自然又產生一種主從關係。他們的勢力一派傳壇，一直到宇垣纔趨凋落。他們怎樣纔會被前輩首腦賞識呢？才具之外的唯一要件即是鄉土的關係，檢查他們的籍貫，都是出身長州，就是所謂長藩，所以過去的舊軍人是以鄉土爲主要結合的。由此使我們更了解一層，即新軍人的力量與其說發自首腦，無寧說發自中下級幹部（自然不是絕對的）而舊軍人的中下級幹部則完全沒有力量，力量純握在首腦手裏。

方纔講到新舊軍人的異點，對於新軍人只是一種籠統的概括的說明，實行其內部的陣線也並非一致的。在現階段，其間的勢力大致可分三派，即我們平常聽到的所謂以林銑十郎爲領袖人物的漸進派，以荒木貞夫爲領袖人物的急進派，及以松井石根爲領袖人物的中間派。時潮所趨，各派間的政治主張甚少區別，對舊軍人的主張而言，都比較

充實，具體，而適應時潮，都是急進的派系。但就新軍人的本身說，因貫徹主張所採取的方法或態度的不同，在同一急進中又細密地分出急進與漸進的區別，而這種歧異的立足點不在對外政策，主要在於促成內政改革的方法上。如荒木陸相期內，他是利用軍部中唯一具有政治發言人資格的陸相的地位，把軍部的一切內政改革主張完全由陸相一人在閣席上，議會中大聲疾呼以作積極的發言，強力要求實踐，普通地干涉到其他各部主管的事項，不惜與內閣及政黨作正面衝突。這樣極度發展的結果，勢非走到倒閣，另建軍人能支配的政權或自行掌握政權的局面不可。因以一時曾流行過以陸軍爲中心的政治計謀，企圖實現平沼內閣或軍政府的謠傳，這非完全無原故的。及林銑繼荒木膺任陸相，不滿荒木這種強硬動作和直線方式，認爲此種方式難以成功。於是轉換一種比較紆迴漸進的方式，在閣議上策動成立一種由軍部的中堅將校及各部具改革熱忱的新官僚聯合組織的內閣調查局，在政府的一角建築一塊新陣地，使通過此種新組織，而合法的推動全面的內政改革辦法，企圖減少陸相在閣議上的發言，以掩飾軍部干政的面目，而避免與內閣，議會作正面的衝突。繼着此種方法確立的必然趨勢，當然要設法阻止少壯軍人政治上的自由言動，因以引起所謂統制運動，實行人事更替，罷斥急進分子而進用穩健人物。這無非欲納少壯軍人於常軌，使軍部內的事權統一，意志一貫，力量集中，因以更加強軍部對於政治之實際支配力量，更易貫徹原來所抱之主張。由此種方法論

106574

的不同，遂致形成荒木的急進派與林銑的漸進派。而松井一派既不全同情於荒木派的急進，也不甚悅服於林銑派的漸進，具一種調和的氣味，因以形成其中間派。派別的分立，容許也滲透了一點權利爭奪的意味，但中心關鍵仍在政治方法論的不同，這是無疑問的。

但這些派系在目前似尙未形成堅固的壁壘，每派內除開少數中堅幹部外，其餘所謂次要人物，恐仍有不少的游移分子。如松井、川島都原屬荒木派的，但在荒木與林銑兩派形成對立之局的時候，松井產生了自己的主見，遂在鬥爭中演變而形成爲中間派。川島繼林銑而任陸相後，他的政治方法既不若林的緩和，也不像荒的急進，而對於林相的肅軍運動也并不完全放棄，一切都帶着調和色彩。這雖屬時勢使然，但站在派別的立場觀察其政治方法，顯見他並不全受荒木派立場的拘束。假使他不是由着這次「二二六」的政變，感於陸相地位的責任問題而辭職，逐漸另外演成一種新勢力，並非無可能性的。同時我們知道今日軍人內無派系色彩的依舊很多，在此動盪多事之秋，即欲保持超然，恐終有不少人最後不能不轉入鬥爭的旋渦，而帶上派系的色彩。那些已有立場而立場欠堅定的分子，隨着時勢的推盪，必然也將激起起伏不已的分化，合併的波瀾。所以現階級日本陸軍的派別不是固定不移的；茲後隨時勢不斷的演變，而推動着分化、合併、新衰、衰敗的大小波瀾，也有可能。然而今後不管派別上發生如何變化，政治的基本主張卻難產生何種較著的改變。因這是一種大勢的產物，這大勢是由國內

國外的政治、經濟、社會多方面的歷史所鑄成（當然國內爲主）。這大勢的主力在現階段的日本就停駐在一般少壯軍人中間；居領導地位的領袖們恐怕只能在方法的執行上有什麼異見，主張是不會也不能有多大改動的。試觀由荒木到川島，其間經歷三屆陸相，他們儘管方法異趨，其忠實地企求同一主張的實現則無二致。就是繼就職不久的寺內新陸相，他是無色彩的軍官，然剛跨進相邸就不得不向廣田提出強硬的改革要求，這顯然是受着大勢之支配而莫能自己。再，即是方法的更變，倘長久沒有能力贏得少壯軍人的服從，也一樣難以繼續的。去年八月永田軍務局長及最近渡邊教育總監的被刺死，就是明證；而林陸相之辭職當然也寓有相當的對少壯軍人退卻的意義。所以今後派別演化的基點，不在根本主張的更變，也仍在方法的異同，這點或可斷言。同時我們知道今日日本軍人內部雖然發生了派別的分立，但在應付外界的爭鬥時，大體是仍能保持一種大團結的。這與幾十年來軍人對外壁壘森嚴的長期傳習有關，而今日存在的這一種大勢力亦有相當作用。這趨向在今後軍人內部派別的演變中，大體是仍當繼續下去的。

以上論列，幾全偏重陸軍，海軍很少提到；這是因爲海軍素抱沉默的傳統態度，向有「沉默的海軍」之稱，少可論述之故。日本的海軍除在倫敦會議爲中心發生過艦隊派與紅瓦派的軋轢，及「五一五」事件後海軍將校曾參與過激烈的政治運動這兩件事上頗有打破其

歷年傳統態度的傾向以外，在過去及現在輒一貫的繼續其沉默主義。平常只對於軍縮會議，建艦競爭等類本身問題吶喊吶喊，很少如陸軍樣的侈談政治社會改造問題的。現在的海軍部仍然繼續爲薩藩所把持，「九一八」後的青年將校雖也漸漸起了變化，不過沒有陸軍的厲害，高級首腦的力量仍然不小，首腦間也少派別的對立。一般講來，歷年海軍輒是跟在陸軍之後，當作陸軍的一個有力助手。所以差不多可以說，現在的陸軍就是整個藩閥軍人體系的代表，把握了陸軍在政治上的動向就把握了整個軍人體系在政治上的動向。

三 藩閥軍人得勢原因的解說

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資產階級不但支配着一國的生產（即經濟），同時還左右着一國的政治。操縱政治的方法，就是在民主憲政漂亮名詞的掩蓋下，以政黨爲國家政治舞臺上的幕前活動人，而資產階級則恃其經濟的權威藏在幕後一幕一幕的導演。政黨名義上代表大多數的人民，實際上是少數資本家的御用人；政黨在表面施點小惠敷衍人民，在暗中卻替資本家建築整個的利益。這是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必然的結果。

日本明治維新開始以後，即走入資本主義的大道，到近代業已臨到資本主義的第三期，即所謂爛熟期，這是大家都曉得的。然則爲什麼她的民主憲政不能如英法之發展，資產階級的御用人——政黨和議

會不能恆常把握政治的核心，而反常爲由保守的封建勢力蛻化出來。藩閥軍人所占持了呢？要說明這原因，請先溯原民主憲政的起源。

當曩昔封建時代，國家的政治經濟大權統握在國君及少數領主之手。那時的社會是一種農業社會。嗣後國內機械漸次發明，工業漸次興起，跟着工業發達的結果，就是資產階級的產生及資本主義的形成。從經濟的見地講，農業決敵不過工業，這時候於是工業代替了昔日農業的地位，農業社會變成了工業社會。在昔日農業社會的時代，國內的生產中心在農業，即經濟中心在農業，即經濟勢力握在同時兼爲大地主的國君及少數領主之手。迨工業社會取農業社會的地位而代之後，經濟勢力自然轉移到了經營工業的資本家的手裏。但是另一種的政治力量卻虎視在側，資本家的經濟活動總不免要感受到一種牽制或壓迫的痛苦，於是想進一步能夠支配着政治。但見於少數資本家的力量難以成功，於是在漂亮的民主主義高唱之下，激動一般人民的自尊觀念自利心理，啓發一般人民對於民權自由思想的自覺，爲着人類的光明本身的利害，共同向封建勢力猛攻。經長期奮鬥的結果，民主憲政乃光榮的誕生。像英法一般民主憲政國家，都是這樣產生的。不幸這光榮的背後是欠光榮的，民主的實際是不民主的。國家的政治大權，有智識的中產階級算是分得一杯湯羹，幕前活動的政黨人物他們成了主要角色；另外大多數的無智識的無產階級卻仰望不到政權的邊際，至多不過茫然的舉回手投次票；而實際的大權則操在有智識而又雄

106576

於資財的資產階級之手。這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機構。

由此可見英法諸國的封建體制的破壞，民主憲政的成立，是因為在國內先有產業的興起，先有資本家的誕生，在舊的封建社會內已經孕育了一個與舊社會不相容的資產階級的力量，這力量日趨膨脹，結果產生了資產階級的革命，於是這新勢力代替了舊勢力。這樣，舊勢力當然可以根本廓清，新政權當然可以完全為新興的資產階級所把握。

日本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國家大權握在幕府，天皇徒作垂拱，政令出於二途，國權至不統一。這時採立鎖國政策，拒絕和外人貿易通商。但從嘉永六年（一八五三年）美國艦隊駛入浦賀，強力要求通商以後，形勢大變，幕府不能不屈服，遂有通商約章的訂立。隨後又相繼發生英國艦隊砲擊鹿兒島城，英、法、美、荷聯合艦隊打下關種種事情；結果日本與各國訂了居留地，領事裁判權各項不平等的制度的條約。同時國內一般愛國志士在外侮日亟的時期中高唱攘夷排外的結果，亦無補時艱；於是漸由盲目的排外，變為師法外國的趨向。而奉政天皇以求國權統一之議又首唱於有力志士之間，強大的藩主亦表贊同於後，於是有慶應三年（一八六七年）幕府德川慶喜還政天皇的結果。次年改元明治，從此明治維新開始，冀圖富國強兵，以躋於歐美列強之林。所以日本政治改造的主因是起於外力的壓迫，政治改造的目標是富國強兵。他們既已承認外國人的優長，於是覺得要想富國強兵，非師法外國不可。於是把德意志的憲法搬了回來，把新式的海陸軍制建設了起

來，把歐洲資本主義的科學生產方法，生產組織學了回來。於是在政治方面有了統一而民主的憲政，在武力方面有了新式而強力的海陸軍隊，在經濟方面有了科學化的工業。工業的興起，必然誘致資產階級的產生及資本主義的形成；於是這新興的工業在國家的保育政策可漸漸發育起來，而新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也自然的隨着發展下去，到了近代，日本的資本主義遂也跟歐美諸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進入了第三期的爛熟階段，雖然牠是一種變態的資本主義。

由此可知日本封建體制的破壞，民主憲政的成立，與英法諸國不同。不是先在國內產生了一種與舊社會不相容的資產階級的新力量，舊封建體制不是為這種新力量所摧毀；而是外力不斷的壓迫，使日本封建的諸支配階級為要免除自己淪於歐美的殖民地的悲運起見，不得不自己發動一個政治改造運動，不得以自己的鐵手毀壞了自己的封建體制，而走入民主憲政之途；同時在執政者的庇護下，漸漸的產生了資產階級，育成了資本主義，終於變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所以日本的資本主義與英法諸國的資本主義不同。英法諸國的資本主義是由自己的力量而發展，而打倒了妨害自己發展的舊封建體制，而建立起自己的新政權。日本的資本主義要憑藉封建的勢力打破了舊封建的體制之後，自己在他人勢力的保育下漸漸發育起來，這樣，表明自己力量的不能獨立及脆弱的特質，當然不能有力的建立起自己的新政權。新勢力沒有力量從舊勢力手裏奪取政權，舊勢力自然不會毀

壞了自己的軀殼之外，再毀滅掉自己的靈魂。所以，封建的體制雖已摧毀，封建的精神依然存在。舊封建勢力中最有力量的是手握兵馬大權的藩閥軍人，所以藩閥軍人依然在日本的政治上把握着很大的勢力。所以日本不能完成像英法一般國家的民主憲政，主因就在日本的封建體制之破壞與民主政治之成立，和英法諸國不同；換言之，即因為日本的資本主義的特質異於英法諸國的資本主義的特質之故。日本的資本主義對英法諸國的資本主義而言，是一種變態的資本主義。

日本的資本主義是跟着時間向前發展的，即日本資產階級把握政權的力量是朝前推進的，這種推進不已的力量，是有逐漸擊退藩閥軍人的勢力，進一步而取代其地位之可能的。不過新興勢力要打倒既存勢力，自較困難。譬如維新開始不久，舊勢力的藩閥軍人就首先把勢力插入海陸軍部，國家兵權，全部在握，他人無插足的餘地。嗣後又在元老與軍部的壁壘內在政治上取得特殊的權利，這種地位的形成，更成一種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優勢。在這種情形之下，後起的資產階級要想反擊，自然比較不易。而除此之外，又以左列的原因，加重使資產階級勢力的發展，難以和藩閥軍人相頡頏。

(A) 日本民智不若歐美發達，大都缺乏政治訓練；同時社會的保守傳習頗深，不易對民主憲政發生熱烈的擁護情緒。

(B) 日本尙武任俠的國民的傳統性與軍人的氣質最相競合，因此，軍人較政黨容易取得國民的同情。

(C) 日本的民族性充滿了極端狹隘的國家主義的精神及民族自大的觀念。軍人的大陸侵略政策極合日本民族的脾氣，而幾次的對外戰爭又居然次次勝利。這樣，當然增加國民對於軍人的崇拜。

(D) 政黨力量的能否充分發揮與資本主義的能否充分發展固有極密切的因果關係；但政黨本身主觀的振奮，在政治的活動上亦自有其相當獨立的作用。日本政黨組織的鬆懈不健全，黨員的腐敗少操守，是從古至今皆然的，而到現在且每況愈下。所以政黨自己的不振作，也是日本憲政不易發達的一個因素。

歐戰後，由於日本民智的漸次發達，日本元老的相繼凋落，以及和平自由思潮在全世界普遍的澎湃——日本也受着此種思潮澎湃的影響，就是軍隊中也有許多青年軍人，也受到這種思潮的感化，一時走入呈請辭職的一路者頗衆。尤其是日本乘人家都忙於戰爭忙於消耗的時候，自己加工製造，到處兜攬生意，資本主義因以獲得一度飛躍的大發展。凡此種種，在國內政治上的影響，就是資產階級勢力的空前的擡頭，從大正七年到昭和七年的十餘年中，兩年的藩閥及貴族內閣除外，都是政黨內閣不斷的繼續，選舉改革案及普選案先後獲得通過，選民增加無數。

這種情形倘再繼續發展下去，資產階級頗有取代藩閥軍人勢力的可能。可惜隨着資本主義飛躍的結果，弊害即逐漸顯露，反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已侵入日本社會，共產黨也漸漸擡頭起來。一九二九年

106578

(昭和四年)世界經濟恐慌發端以後，資本主義的毒害更是高度暴露，到處是工人失業，農村破產，工廠倒閉，金融停滯。美國的羅斯福新政，英日諸國的金本位放棄政策一切一切枝節的改革，醫治不了全身潰爛的瘡痍，資本主義已完成了牠歷史的使命，現在已臨近無可救治的死亡期了。在此行將絕斃的前夕，政黨的腐敗，議會的無能，愈益暴露出來，與資本主義本是形影一體的民主憲政更加喪失了牠的力量與信仰。同時標榜實行共產主義以消滅資本主義毒害的共產黨的勢力，在社會上也跟着愈更澎湃起來。共產主義與日本藩閥軍人的傳統意識顯然是絕難調和的。名義上仍居政治領導地位的政黨內閣對於日益尖銳的經濟恐慌，日趨洶湧的共產勢力均毫無解決的善策。日本軍人在政黨無能的憤慨中；在共產勢力物極的危懼下；再加以對於近年政黨對軍部到處採用進逼態度的懷恨，與對於當日幣原對華溫軟外交的不滿；以及在德意法西斯取代議會政治，剷除共產勢力，變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一線成就的暗示下；同時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的現在

狀的法西斯的趨勢。結果，遂有昭和六年的「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及次年「五一五」的政變，之後繼續發展，又發生最近的「二二六」政變。戰後的情勢本有利於日本政黨政治的發展，不意資本主義的毒害潰爛得太快，在資本主義毒害全部爆發之下，更加暴露了政黨政治的無能，同時誘致了共產勢力的蓬勃；終致軍人爲了自救救人，不能不奮然跳了出來，到現在幾有一脚踢倒共產黨人，一手推翻議會政治，進而獨掌政權的趨勢。

產制下，農村較都市是處於較劣等的地位，農村是必然要受到都市資本企業家的壓榨的，所以在此全國經濟恐慌的洪潮中，農村的困苦要比都市更甚，而日本的軍人大都來自農村，因在全國恐慌的戟刺中，感覺最敏銳最不平的恐怕要算軍人集團了，近代軍人是有相當知識的，軍人的性質是比較激烈的，而軍人的本身也原是有組織的團體。由上述種種因素的湊合，於是軍人集團中逐漸形成一種企圖突破現

總括一句，日本藩閥軍人在政治上得勢的主因，過去在於日本資本主義性質上的變態，現在在於日本資本主義毒害的爆發，都是日本資本主義所決定的；其餘如前所述的衆多原因，則統圍繞在這主要原因的周遭發生大小不同的助力。

黨對軍部到處採用進逼態度的懷恨，與對於當日幣原對華溫軟外交的不滿；以及在德意法西斯取代議會政治，剷除共產勢力，變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一線成就的暗示下；同時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的現在產制下，農村較都市是處於較劣等的地位，農村是必然要受到都市資本企業家的壓榨的，所以在此全國經濟恐慌的洪潮中，農村的困苦要比都市更甚，而日本的軍人大都來自農村，因在全國恐慌的戟刺中，感覺最敏銳最不平的恐怕要算軍人集團了，近代軍人是有相當知識的，軍人的性質是比較激烈的，而軍人的本身也原是有組織的團體。由上述種種因素的湊合，於是軍人集團中逐漸形成一種企圖突破現

最後，擬對日本軍人今後的政治前途略作推測。從前面我們知道，日本政黨政治日趨沒落的主因是由資本主義毒害的高度潰爛。在這種毒害日趨發展的過程中，隨着發達了（一）以毀滅資本主義，創造新共產社會爲宗旨的共產黨團，及（二）以改良資本主義，樹立新封建社會體制爲宗旨的軍人法西斯和民間其他右翼團體。雙方各持救時良劑，爭要問世。居此一切都在演變的時代，日本政治上已經露出及可能露面的政治形態或勢力，概括說來不外三種：即上述的兩種以及原持民主主義政黨政治的既存政黨。資本主義日趨潰爛的劫運既難挽回，與資本主義本是形影一體的既存政黨，自無獨立存在的理論根

據。但倘能變質，即是傾向政治經濟的高度集權，大加修正原來的政治立場，這也許是唯一可能嘗試的再生途徑。然囿於其經濟背景和政治傳習，政黨中頗難步調同一；則因見解的異同而發生多角的分化，恐為必然的歸結。如此，政黨力量將更分化，依舊難為政權的爭鬥。結果，這一部分變質的政黨，不為軍人遺棄，或者即將投入軍人的陣內。加以日本政黨向以腐化少節操著稱於世，既非勁草，安能爭勝於今日的狂飈時代。況事實上這些政黨早已追隨資本主義毒害的蔓延而日趨沒落的悲運，在「五一五」到「二二六」的歷史進程中，已明顯的透示着這一種結論。所以這三種政治勢力中，既存的民主政黨是少有前途的。

共產黨拯濟時艱的理論或者要比法西斯右傾團體的澈底，但把一所舊房子全部拆毀，完全改造一棟新的大廈，所要付與的犧牲及所須經歷的艱難，實無極限；人類社會的惰性很難獲得一般的克制，最艱苦的道路非環境逼到完全不能不走時是喜走折中的道路的。資本主義的弊害既已暴露到今日這種地步，除少數資本家仍在為牠作最後的掙扎結果還是不得不相當讓步投入法西斯派的改良資本主義的途徑外，其餘一般人既深受資本主義毒惡的痛苦，當然是終要投入改



良的法西派或根本推翻資本主義的共產派的。但衡諸前述的道理，在中間性的改良派還不會以事實證明其藥方是否有效以前，不是說沒有即刻願嘗更苦的藥的人，但多數人願同情改良派的中間道，可能性恐要較大一點。而幾年來共黨勢力在軍人等法西團體的壓力下的不易發展，及軍部領導政治力量的日趨強化，也是明顯的事實。日本軍人在政治上的威勢既具傳統的歷史，同時軍部之獨握國家武力的全部，這也是軍人在與政黨及共產團體政爭中較易致勝的一個有力原因，也正因着這一點，其餘右翼團體在今後與軍人法西斯關係的演變之結果，除也許有少數未能合作外，其終將形成以軍人法西斯為中心的日本法西斯大團結，及排斥一切民主政黨和左翼勢力而成立以軍人法西斯為中心的右傾法西斯獨裁內閣，都是極有可能的。不過目前以元老、重臣、政黨、財閥諸自由主義的殘存勢力仍未放棄其最後的掙扎，與軍人本身之尚待調整，以及軍人法西斯與其他右傾團體關係之尚未臻於密接，也許時間上還有所待，這是難決然肯定的。

三、二五、一九三六。